

张从正论补法探析

周 海 虹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张从正, 字子和, 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张氏之学, 宗奉《内经》、《伤寒论》, 并受刘完素“火热”理论及其治病经验的影响, 形成了以攻邪祛病为核心的独特的学术思想。临证善用汗、吐、下三法, 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 被后世称为攻邪学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 张从正不仅重视攻邪治病, 而且对补法的认识和运用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这从其代表著作《儒门事亲》中可窥见一斑。

有邪有积, 以攻为补

张从正之所以重视攻邪, 是从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认识出发的。他认为疾病并非人体本来就有的, 而是由邪气“或自外而入, 或由内而生”的结果, 把致病的症结紧扣在“邪”字上。“邪气加诸身, 速攻之可也。”若邪气留恋不去, 必然损伤正气, 故欲保护正气, 必须先驱除邪气。基于此观点, 他在阐述补法时说:“余用补法则不然, 去其气之偏胜者, 其不胜者自平矣。医之道, 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故“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这些话反映了他攻邪即是补虚、祛邪足以扶正的学术思想。如他在治疗胃肠方面的疾病时, 认为“大积大聚, 大实大秘, 大滯大坚, 下药乃补药也。”当胃肠存在痰饮、宿食、热毒、虫积、瘀血等实邪, 无疑会阻碍正常的吸收、消化、转输、传导功能, 且可累及其他脏腑经络。只有运用攻下药祛除实邪积滞, 才能恢复脏腑功能, 从而起到真正的补益作用。

邪实正虚, 攻邪为先

当疾病出现虚实夹杂、邪正相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时, 患者往往在表现实证的同时, 兼见不同程度的虚象。张从正主张仍应以攻邪为先, 使邪气去而正自安, 或采用先攻后补之法, 不可亟投温补之剂, 否则无异于以粮资寇。他说:“余虽用补, 未尝不以攻药居其先, 何也? 盖邪未去, 不可言补, 补之则适足资寇。”在张氏医案中,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如曾治疗一 50 多岁妇人, 患血崩一载。张从正认为此属天癸已尽, 本不当血, 盖血得热而流散, 非寒也。世人皆以虚损治之, 莫知其非。遂投以大剂黄连解毒汤, 次以香附、白芍、煅当归同

为细末, 水调下, 又服槟榔丸, 不旬日而安。又如治疗一腰痛岁余患者, 诊其两手脉沉实有力。先以通经散下五、七行, 次以炒杜仲为末, 每服三钱, 猪腰子一枚, 掺药于内, 裹以荷叶烧熟, 临卧细嚼, 以温酒送下, 每旦以无比山药丸一服, 数日而愈。

邪去正虚, 重视食补

张从正提出“治病当论药攻, 养生当论食补”, “以谷肉果菜养口体者也。”邪气侵犯人体, 当用药物驱逐邪气。但“病蠲之后, 莫若以五谷养之, 五果助之, 五畜益之, 五菜充之。”主张以谷肉果菜补益养生。他尤其注重病人的“胃气”, 曰:“善用药者, 使病者而进五谷者, 真得补之道也。”张氏认为:“凡药有毒也, 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 虽甘草、人参, 不可不谓之毒。”因此, 久服之后, 即使很微小的毒性, 也能逐渐蓄积而成为“药邪”, 从而损伤人体正气。就是甘缓无毒、补益和中的甘草, 久服、误服, 补之不当, 也足以致害。所谓“气增而久, 夭之由也。”因此, 他强调以食物补虚调养, 使脾胃健运, 食欲增进, 能够正常摄入所需营养物质, 才是掌握了补法的真正含义。

脉脱下虚, 始投补剂

张从正强调食补的重要意义, 但并不排斥用补剂, 关键是要严格掌握适应证。他说:“余尝用补法, 必观病人之可补者, 然后补之。”如他曾治疗一病虚羸者, 泄泻褐色, 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 两手脉沉而软。张氏诊为洞泄寒中证。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 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 不数月而愈。他还认为, 只有“脉脱下虚, 无邪无积之人, 始可议补。”如治疗肾阳不振, 虚损无力, 用无比山药丸、鹿茸丸温阳补肾; 治疗肾阴亏虚, 用加减小八物丸、当归饮子补养精血等。

综上所述, 张从正对补法的认识可归纳为: 有邪有积, 当以攻为补, 使邪去而正安; 邪去正虚不甚者, 则依赖食养为补; 唯虚损之重证, 以及下元极虚之人, 方可考虑药补。由此可见, 他是把补法看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包括祛邪法, 而达到恢复正气的一种客观效果。

(收稿日期 2003 年 2 月 20 日)